

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①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摘要: 在最近的30年里,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生态语言学框架中研究语言与生态的问题。本文的目的是勾画一个中国语境中基于韩礼德理论的话语生态分析模式——和谐话语分析。本文首先对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和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进行描述,然后讨论和谐话语分析的哲学根源、研究目标与原则、理论指导、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主题词: 生态批评话语分析; 和谐话语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82(2018)04-0039-08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8.04.006

1 引言

生态批评话语分析(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在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所涉及的范围要宽广得多,不仅仅是研究社会结构中的话语实践问题,而且还研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其他物种(包括人与动物、植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批评话语分析一样,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也是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与分析者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关系紧密。但是,无论是批评话语分析还是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它们通常都是站在“弱者”和消极的立场看待事情,希望通过批评、揭露或挑战的方式来改变现状。因此,分析者通常是站在“弱势”(被弱化、被边缘化、被控制、被压迫、被剥削)的一方,往往与社会主流相悖。

本文在回顾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和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对所提出的“和谐话语分析”(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黄国文,2016;赵蕊华、黄国文,2017)进行勾画,试图从其哲学根源、研究目标与原则、理论指导、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等方面对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进行探讨。

2 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

简单地说,话语分析开始于20世纪50到60

年代,发展于70年代,成熟于80到90年代。最近20多年来,话语分析的研究发展迅猛;由于它涉及了很多学科领域,因此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语言学领域的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黄国文、刘明,2016)。

2.1 话语分析的发展

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与发生在哲学界的“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话语转向”(the discursive turn)联系紧密。所谓的“语言转向”,指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在经历了古希腊形而上学和近代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之后,开始认识到哲学中诸如“思维”和“意识”等问题本质上是语言问题,这样语言就被认为是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所谓的“话语转向”,就是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语言问题”不是孤单句子本身的问题,而是语言在现实生活(使用)中的话语或语篇,因此,必须把关注点集中在现实的话语,探索语言的实际使用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出现“话语转向”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生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性质上一直在发生变化,因此,人们赖以生存的话语成了社会实践的主要“中介”,因为社会生活(包括言语、行为)的本质是话语的,是受到话语影响和操控的。

由于话语分析涉及很多学科领域,所以它的属性就是“多学科”或“跨学科”;因此话语分析的方法也就是多学科或跨学科方法。

作者简介:黄国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
E-mail: flshgw@scau.edu.cn。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 话语分析有很多种路向 (approach), 不同的研究路向是由各自的理论来源、学科背景、研究目标和方法决定的。例如, 会话分析主要源于北美的社会学, 功能话语 (语篇) 分析主要是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批评话语分析则是受到Karl Marx、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Louis Althusser、Michel Foucault等人的影响、基于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的话语分析路向。不同的分析方法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清晰分明的, 而是相互交叉甚至相互包含和借鉴; 它们是并存的。实际上, 不同的研究路向处在一个连续体上, 一端是语言学, 另一端是社会文化分析。

话语分析视角的多样性、方法的不一致性和解释的差异性彰显了它的性质和生命力, 因为语言是多样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丰富多彩的、人们的世界观是有差异的。要真正了解话语与社会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和操控力, 就必须不断从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吸取给养, 促进学科之间的对话, 这样才能满足我们对话语分析的需求。

2.2 批评话语分析

我们 (黄国文、徐珺, 2006) 曾参照Cook (1998/2001) 的分类, 区分了话语分析的三种研究路向: (1) 英美学派 (The British-American school); (2) 以法国哲学家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理论为基础的学派; (3) 批评话语分析学派。英美学派主要指发端于英美研究传统的话语分析, 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中期伦敦学派奠基人John R. Firth对言语意义的研究, 关注点从语言使用开始。福柯学派主要受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影响, 强调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影响力和操控力, 因此它更注重社会文化分析 (涉及话语秩序、意识形态、社会联盟与社会活动) 以及语言、话语使用过程中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而不是语言分析或话语分析本身。

批评话语分析学派介于两者之间, 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批评话语分析也称批评语言学, 有时也称批评性语言研究 (Critical Language Study) 或语言学批评 (Linguistic Criticism)。它不仅研究语言的作用, 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作用 (功能); 研究者不仅仅对话语表达的意义 (或隐藏的意义) 感兴趣, 而且对其如何

产生那些特定的意义感兴趣。它认为语言并不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交际工具, 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 它希望通过分析语言的表现形式来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制约和操控以及话语所折射出的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 使话语对意识形态起反作用, 影响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因为它将话语看作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 所以既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话语的影响、制约和操控作用, 也强调话语对社会文化的构建和促进作用。

顾名思义, 批评话语分析的出发点是“批评”, 但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 关于“批评”就有了一种新的定义。很多人都把批评话语分析中的“批评”理解为批判、揭露、否定。但是, 也有一些批评话语分析者对“critical”有不同的理解。例如Wodak (见Kendall, 2007) 就明确指出, “critical”指的是“不想当然” (not taking things for granted), 要揭示复杂性, 要挑战“还原主义” (reductionism)、“教条主义” (dogmatism) 和“二分法” (dichotomies), 要自我反思 (self-reflective); “critical”不是指大家平常所说的否定意义, “critical”也包括提出不同的选择 (alternatives)。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意义和形式 (“潜势”与“实例”) 之间辩证关系的思想、语境 (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上下文语境) 与语言之间关系的思想、语言的元功能思想和语言的“干预” (intervention) 作用 (功能) 思想, 在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被广泛使用。无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还是批评话语分析, 他们都关注话语在社会中的作用, 都通过社会和文化因素来突出语言对社会的影响。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有相似或重叠的地方 (Matthiessen, 2009: 20), 但从“批评”的角度看, 批评话语分析表现得比较直接和公开, 因为它的初衷是要对社会的权势关系和不公平进行揭露。系统功能语言学比较温和, 虽然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关注社会问题, 是个有社会理据的理论; 它强调要将语言置于其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之中进行考察, 这样来解释语言的特征和本质, 同时也强调要将语言学应用于其社会环境之中, 把语言学当作一种干预方式, 对社会活动进行审视和思考, 这就是Halliday (1993/2003: 223) 所说的关注社会问题的语言学 (socially accountable linguistics)。因此, 在很多批评

话语分析的活动中, 可以容易找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身影。

2.3 积极话语分析

积极话语分析的提出, 是相对于批评话语分析而言的; 但是, 正如Stibbe (2018a: 168) 所说的, 它不是用来替代批评话语分析, 而是用来“补缺” (Complementing), 在批评的基础上寻找正面的、积极的方方面面。虽然批评话语分析能揭示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以及社会中的不平等关系, 但这种做法本身是站在消极的立场去观察和分析问题的, 因此所带来的后果很多是消极的、反主流的或反政府的。因此, 就有人开始思考应该以什么立场去分析话语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例如, Kress (1996, 2000) 和Luke (2002) 都提到, 批评话语分析不仅是要揭示社会中的不平等、不人道和有害的事实, 更应该是从批评阅读、分析和解构把解构转化为一种建构, 应该是通过揭示不平等去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 而不能太过于强调批评和批评研究, 不然会让人们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十分不好的环境里。Kress (2000) 还提出了“设计” (design) 这一概念, 指出话语分析不应该从消极的立场出发, 而是有意识地设计美好的未来。Luke (2002) 则主张以建设性的方式使用权力。

积极话语分析这一术语是Martin (2004/2012) 首先提出来的。他所说的积极话语分析采取的是“进化的” (evolutionary) 而不是“革命的” (revolutionary) 方式。他认为, 批评话语分析是解构的, 而积极话语分析是建构的; 批评话语分析是对残酷的“现实” (realis) 的批评分析和揭露, 而积极话语分析则是对美好的“非现实” (irrealis) 的不断争取。这个分析框架的假定是, 我们需要的是建构性的理论, 要选择互补而不是对抗, 要采取“阴/阳”视角, 用其来弥补批评话语分析在考察权力关系时对社会造成的不好的影响, 通过话语分析实现和平语言学, 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因此, 积极话语分析不像批评话语分析那样聚焦“霸权”争斗 (控制与反控制) 问题, 而是注重“社区”和谐 (结盟与协商) 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积极话语分析进行探讨 (如Macgilchrist, 2007; Bartlett, 2012, 2018; Stibbe, 2015, 2018a), Arran Stibbe (如Stibbe, 2015, 2018a, 2018b) 则把这一概念

用于生态语言学研究。

有些学者 (见Bartlett, 2018: 137; Stibbe, 2018a: 174) 认为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一样, 过分看重语言的作用, 而没有更多地从话语产生的社会因素去考虑语言所传递的意义; 但也有些学者 (如Stibbe, 2014: 124) 认为, 在推广积极语篇 (positive text) 方面, 积极话语分析比批评话语分析做得更好。这是因为, 它们的站位不一样, 一个是对立的角度, 另一个是联盟的态度。Bartlett (2018: 145) 则认为, 话语分析的不同路向如果形成一个“实践连结” (a nexus of practice), 就可以为话语分析的积极和干预取向建立一个制高点。简单地说, 积极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点是: 前者除了考察消极的因素外, 还寻找或希望积极的方方面面, 不像后者那样站在“弱者”的立场, 只关注社会中的消极情况。

3 生态批评话语分析

生态语言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慢慢发展起来的。对于语言生态或生态语言学的研究, 一开始就显示了这是一个跨学科领域的课题, 因为它至少涉及语言与生态这两个学科的问题。由于生态的问题越来越变成所有人关注的问题, 又因为关于生态的话语分析总会涉及对目前普遍面临的生态环境的问题的评价、批评和对改进生态环境的建议和呼吁, 所以就自然地与批评话语分析有共通之处, 因此就有了“生态批评话语分析” (Fill & Mühlhäusler, 2001), 所涉及的话题有政治报告、绿色广告、环境问题报告等。2001年出版的《生态语言学读本: 语言、生态与环境》 (Fill & Mühlhäusler, 2001) 所收录的27篇文章, 其中9篇就属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方面的内容。Halliday (1990) 就被认为是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的急先锋 (参见Stibbe, 2018a: 165-166)。

批评话语分析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点是: 前者研究的是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后者则把研究范围扩大到自然中各种物种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作为自然界物种的人与其他物种 (包括动物、植物) 之间的关系, 因此涉及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流失、资源的消耗、化学物所带来的污染等。

随着生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各个学科对

于生态问题更加重视,导致“生态转向”(the ecological turn)的出现 (Stibbe 2015)。早在30年前,李继宗、袁闯 (1988)就论述了当代科学的生态学化问题,认为当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变化清楚地反映出科学的生态学化趋势,生态学或生态问题研究已经并将继续从多方面推动当代科学的综合趋势。我国生态学家李文华院士主张用基础生态学、广义生态学和泛义生态学的界定来揭示生态学的内涵:(1)基础生态学属于自然学科,研究的是不同水平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2)广义生态学指的是研究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群体与周围环境和 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科学,(3)泛义生态学则是指综合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及由此抽象出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来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它是生态学向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展与延伸 (邹冬生、高志强, 2013: 1)。

在生态转向的大环境下,出现很多与生态有关的学科,就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而言,就有生态心理学、生态女性研究、生态社会学、生态批评、环境沟通、生态文学、生态语言学等。在一定程度上说,现在什么学科都与生态有关。因此,在生态语言学界,Alexander & Stibbe (2014)提出对“对生态话语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如对生态环境有关的话语的分析)和“对话语的生态分析”(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进行区分。他们认为,在自然界中形成、保持、影响或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中的其他物种和一切环境的关系这些复杂的过程中,语言是起重要作用的;因此,生态语言学要研究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和一切与环境有关系的问题;因为,从生态视角看,所有话语都反映和影响甚至控制了人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从而导致人们对周围的一切 (包括与其他人、与自然、与环境)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生态语言学要研究的问题之一就是语言在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基于这样的假定,他们 (Alexander & Stibbe, 2014: 109)特别指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不仅仅限于那些关于生态问题的话语 (如与环境问题、生物多样性流失有关的话语),而应该包括可能导致人们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的所有行为和话语。这种观点的理据是:所有话语都会对人们的行

为产生影响,人们的行为又会对生命赖以依存的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基于这样的观念,他们提出,我们应该从生态的角度对所有话语进行分析 (即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而不仅仅是分析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关系的话语。

Stibbe (2015)把话语解释为“故事”,即一种影响着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存在于每个人大脑中的认知结构。这些故事影响或左右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根据头脑中的故事来生活,这就是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 (stories-we-live-by)。他把话语分成了三种类型:“有益性话语”(beneficial discourse)、“破坏性话语”(destructive discourse)和“中性话语”(ambivalent discourse)。决定话语类型的标准主要是研究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伦理准则、价值观、生态哲学 (Stibbe, 2015: 11-12, 2018a: 175)。这就是说,同样一个故事,持有不同的伦理准则、生态哲学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例如,“先污染再治理”,对于急于大力推动工业化发展的人,应该是“中性话语”(既有有益的方面,也有破坏的方面),而对于认为无论什么时候 (包括在工业化初期)都应该以生态为中心 (ecology-centred)的人来说,就是破坏性话语。像“先污染再治理”这样的话语,就是一个故事,是一种认知、观念、看法、态度等,如果我们接受、信奉、践行这样的故事,那就变成了我们行为中的原则和理念。因此,Stibbe (2015)指出,对于破坏性话语,我们要揭露、批评、抵制,对于有益性话语,我们要宣传、鼓励、支持,对于中性话语,我们要一分为二看问题,分析利弊、考虑改进的方式。

4 和谐话语分析

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一样,语言学研究除了要有原创性外,应该追求本土化和本土特色。我们 (黄国文, 2016)提出的“和谐话语分析”,就是这方面的尝试。我曾明确指出,和谐话语分析是在中国语境下提出的,目的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物种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我认为,“在中国语境下,‘生态’不仅是指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而是被用来表示‘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黄国文, 2016: 12), 这是因为, 在中国“和谐”已经成为发展的关键词, 它强调各种关系的和谐一致。(见赵蕊华、黄国文, 2017)

要构建和谐话语分析模式, 需要对其哲学根源、研究目标与原则、理论指导、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 已经涉及很多这些问题的讨论(如黄国文, 2016, 2017; 赵蕊华、黄国文, 2017; Zhou, 2017; 周文娟, 2017; Zhou & Huang, 2017), 但讨论还不够深入, 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涉及。

4.1 哲学根源

在中国语境下讨论生态语言学问题, 首先要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和生态哲学观的根源。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是不同的: “中国哲学绝不是离开自然而谈论人文, 更不是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形成所谓人文传统, 恰恰相反, 中国哲学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发展出人文精神。”(蒙培元, 2004:2) 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生”的问题, “生”的哲学就是生态哲学, 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蒙培元, 2004:5)。中国的生态哲学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长河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与中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中国哲学中的“天地以生物为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天人合一”都是主张要与自然界万物和谐相处, 以自然界为精神家园。无论是孔子儒家的“天生万物”还是老子道家的“道生万物”, 都是讲世界的本源(天或道)与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的生成关系和谐关系, 因此, 有学者认为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乔清举, 2013: 331)。虽然儒家与道家在“天人合一”的解释上有差异(儒家侧重“人文”, 道家侧重“自然”), 但在“天人合一”这一理念的理解上, 基本的含义都是“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蒙培元, 2004: 3)。

儒家是“以人中心”的, 这是它的精髓。以人中心就是重视人在万物中的重要地位, 把人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是万物中最‘灵’的, 也是万物中最‘贵’的”(蒙培元, 2004: 58); 人与其他物种一样, 都是自然界赋予的, 但人不同于其他物种(如动物), 人有道德意识, 人有仁性;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上, 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但是, 儒学的“以人中心”“实际上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 不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蒙培元, 2004: 62)。

这里说的儒家的“以人中心”理念, 与近现代西方哲学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同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与宗教和唯心主义有联系的反科学观念, 认为人是宇宙的最终目的和宇宙的中心, 主张人是自然界的主宰, 居于自然界的中心地位; 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蒙培元, 2004: 55)。但是, 正如郑家栋(2003: 11)所说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并不在于一般的追求自然和谐, 而在于谋求自然和谐与差等秩序的统一”, “‘和谐’中本来就包含了‘差等’”; “‘差等’之对于儒家是更为本质的东西”, 这种“差等”观念导致儒家认同和接受现实的伦常法规和等级秩序。从这一点看, 自然界的物种是有“差等”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 我们(黄国文, 2017)在探讨和谐话语分析模式时, 提出了“以人本”的基本假定, 并明确指出, “以人本”, 就是以人民为本; “以人本”与新中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的语境中, “和谐”包含了“差等”, 因此认同和接受现实生活中的伦常法规和等级秩序。

4.2 研究目标与原则

我们(黄国文、赵蕊华, 2017)曾对生态话语分析的目标进行勾画: 探索语言与生态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揭示语言对各种生态关系(包括人类之间的生命可持续关系, 人类与其他非人类有机体的生命可持续关系, 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生命可持续关系)的影响。这个定义是基于Halliday(2007)所说的“系统生态语言学”(systemic ecolinguistics)而提出的, 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不包括“机构生态语言学”(institutional ecolinguistics)所涉及的内容。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 我们研究的语言学理论支撑是Halliday(如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2014; Halliday, 1990, 2007)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指导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Halliday(2007: 14)所说的“*How do our ways of meaning affect the impact we have on the environment?*”(我们的意指方式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我们(黄国文、赵蕊华, 2017)还提出了

生态话语分析的总原则：与天人合一、人类和平、社会和谐、生态环保一致。这与中国主流的、正能量的、和谐的生态观并行不悖。这个原则指导着我们对话语的各种生态解释。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同一个语篇或话语，持有不同生态观的人就有不同的反应和解释，因为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假定和遵守着不同的原则。基于我们（黄国文，2017）的生态哲学观，我们提出了“良知原则”“亲近原则”“制约原则”来具体指导生态话语分析。

4.3 理论指导

和谐话语分析的语言学理论指导主要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如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2014）。Halliday早年开始语言学学习和研究时就跟同伴试图寻求“马克思主义语言学”（Marxist linguistics, Halliday, 1993/2003: 223）。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一直是他自己追求的长远目标，他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在政治语境中研究语言”（见Martin, 2013: 118；另见韩礼德、何远秀、杨炳钧，2015；何远秀、杨炳钧，2014；何远秀，2016）。在2015年4月的一次访谈中，Halliday（韩礼德、何远秀、杨炳钧，2015: 1）明确地说，“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的”。

和谐话语分析所要遵循的是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neo-Marxist linguistics）（Martin, 2000）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原则（见何远秀，2016），因此我们推崇辩证唯物主义，采取整体论（多元论、系统论）而不是二元论。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和谐话语分析的语言学理论支撑，一方面把语言看作政治活动的工具，突出语言的干预功能，把语言研究置于政治语境中的社会实践，另一方面把语言与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结合起来，在语境中研究

语言、语篇和话语以及它们传递的各种意义。

4.4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无论是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还是和谐话语分析，研究的起点都应该是用于表达意义的语言和语篇，因为现实是语言构建的。因此，研究的对象首先是语言、文本（话语），可以采用定性分析，也可以采用定量分析。和谐话语分析方法是对语言、语篇和话语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包括话语所传递的或隐藏的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话语的语义和含义、话语的谋篇和结构、话语的语境、话语的表述、语言的选择、语法的特点，语言与环境和各种语境的关系等等。按照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就是采取三维视角（Trinocular perspective, Halliday, 1996/2002: 408）：从上（from above）、从下（from below）、从周围（from roundabout）来进行分析。（参见常晨光，2010；何远秀，2016）

根据研究目标与原则，遵循所信奉的生态哲学观，和谐话语分析从语言的结构和使用分析入手，用生态的视角审视语言系统、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并把语言放进生态系统中考察。具体的分析表现在语言语义层、词汇语法层、音系层和语音层的特点，然后把语言分析和语境（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分析一起考虑，根据自己的生态哲学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评估。当然，也可以先对话语所表达的宏观意义进行定位，然后通过语言分析来找到证据。

这个研究方法可以达到两个不同目的：一是作为意义表达的语言是怎样构建现实的，二是作为语言系统的语言实例（instance）是怎样反映语言的意义潜能（meaning potential）的。这其实是作为适用语言学 and 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两个界面。

4.5 小结

无论是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还是我们提出的和谐话语分析，其本质都是与“政治”有关的；这个“政治”是广义的，它包含了很多内容。生态语言学家的生态观也是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因此，我们在进行话语的生态分析时，需要考虑文化传统、政治导向、话语产生的背景、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历史影响以及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等。

上面所说的和谐话语分析的哲学观、假定、理论指导、研究目标、总原则和分析原则、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融合的和整合的，而不是分离的关系，它们是一个有机体的不同组成部分，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相互作用，缺一不可。

5 结语

生态语言学和生态话语分析是一个交叉学科，它的基本点是语言和话语，涉及生态学、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多个学科。简单地说，它属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我们所提的和谐话语分析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支撑，用整体的、多元的、功能的、系统的、选择的、进化的视角分析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话语、话语生态和语言系统。

和谐话语分析与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后者的研究范围只限于人类社会的话语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的研究范围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以及自然界中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而且是可持续关系。和谐话语分析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都延伸至人与自然和其他物种的关系，但是前者并非只是揭示这些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或揭露生态问题，而是主要从正面的、正能量的、和谐的因素进行分析和审视，它与生态批评话语

分析形成“阴/阳”互补关系。另外,和谐话语分析应该借鉴Wodak (Kendall, 2007)对“critical”的解释,从自我反思做起,最终实现和谐发展的目的。这样看来,和谐话语分析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不是互补关系,而是处于“正面审视——负面批评”这个连续统上。因此,和谐话语分析的分析路径更为多元化。

生态话语分析是个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活动,所做的分析和结论与分析者的生态哲学紧密相连。我们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是基于中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承、社会发展阶段的实践,具有特别明显的本土意识。因此,它是“中国制造”的。□

注释

①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语》汉英对比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方法”(14BY027)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Alexander, R. & A. Stibbe. From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to 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J]. *Language Sciences*, 2014(41): 104-110.
- [2] Bartlett, T. *Hybrid Voices and Collaborative Change: Contextualising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M]. London: Routledge, 2012.
- [3] Bartlett, T.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A]. In J. Flowerdew & J.E. Richardso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 London: Routledge, 2018: 133-147.
- [4] Cook, G.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K. Johnson & H. Johnson (eds).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 Handbook for Language Teaching* [C]. Oxford: Blackwell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8/2001: 99-101.
- [5] Fill, A. & P. Mühlhäusler.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 London: Continuum, 2001.
- [6] Halliday, M.A.K.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 (6). Reprinted in J. Webster (ed).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3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K. Halliday*[C]. London: Continuum, 1990/2003:139-174.
- [7] Halliday, M.A.K. Language in a changing world [J]. *Occasional Papers (Applie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1993 (13). Reprinted in J. Webster (ed).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3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K. Halliday*[C]. London: Continuum, 1993/2003: 213-231.
- [8] Halliday, M.A.K. On grammar and grammatics [A]. In R. Hasan, C. Cloran & D. Butt (eds). *Functional Descriptions: Theory in Practice* [C]. Amsterdam: Benjamins, 1-38. Reprinted in J. Webster (ed).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3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K. Halliday*[C]. London: Continuum., 1996/2002:384-417.
- [9] Halliday, M.A.K. Applied linguistics as an evolving theme [A]. In J. Webster (ed). *Language and Education*, Vol. 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K. Halliday* [C]. Continuum, London, 2007: 1-19.
- [10] Halliday, M.A.K. & Matthiessen, C.M.I.M.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M]. London: Cassell, 1999.
- [11] Halliday, M.A.K. & Matthiessen, C.M.I.M.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Routledge, 2014.
- [12] Kendall, G. What 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Ruth Wodak in conversation with Gavin Kendall.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2007, 8(2), Art. 29, <http://nbn-resolving.de/urn:nbn:de:0114-fqs0702297>.
- [13] Kress, G.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C. 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Routledge, 1996: 15-31.
- [14] Kress, G. Design and transformation: New theories of meaning. In B. Cope & M. Kalantzis (eds). *Multiliteracies: Literacy Learning and the Design of Social Futures* [C]. Abingdon: Routledge, 2000: 153-161.
- [15] Luke, A. Beyond science and ideology critique: Development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2, 22: 96-110.
- [16] Macgilchrist, F.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Contesting dominant discourses by reframing the issues[J]. *Critical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Across Disciplines*, 2007/1(1): 74-94.
- [17] Martin, J. R. Grammar meets genre: Reflections on the Sydney School [J]. *Arts: The Journal of the Sydney University Arts Association*, 2000(22): 47-95.
- [18] Martin, J. R. (2012a [2004])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 载王振华编. 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马丁文集, 6) [C].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 2004/2012: 278-298.

- [19] Martin, J. R. *Interviews with M.A.K. Halliday: Language Turned Back on Himself*[C].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 [20] Matthiessen, C.M.I.M. Ideas and new directions[A]. In M.A.K. Halliday & J. Webster (eds). *Continuum Compan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 London: Continuum, 2009: 12-58.
- [21] Stibbe, A. An ecolinguistic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14/11(1): 117-128.
- [22] 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M]. London: Routledge, 2015.
- [23] Stibbe, A.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Rethinking human ecological relations[A]. In A.F. Fill & H. Penz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C]. London: Routledge, 2018a: 165-178.
- [24] Stibbe,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ecology[A]. In J. Flowerdew & J.E. Richardso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 London: Routledge, 2018b: 497-509.
- [25] Zhou, Wenjuan. Ecolinguistics: Towards a new harmony [J]. *Language Sciences*, 2017/ 62: 124-138
- [26] Zhou, Wenjuan & Huang, Guowen. Chinese ecological discourse: A Confucian-Daoist inquiry [J].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2017, 12/3: 264-281.
- [27] 常晨光.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5): 11-14.
- [28] 韩礼德, 何远秀, 杨炳钧.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取向——韩礼德专题访谈录[J]. 当代外语研究, 2015(7): 1-3.
- [29] 何远秀. 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30] 何远秀. 论韩礼德的实践辩证法语言研究思想[J]. 外国语, 2017(2): 67-72.
- [31] 何远秀, 杨炳钧. 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与方法论[J]. 东南学术, 2014(5): 20-25.
- [32] 黄国文. 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J]. 中国外语, 2016(5): 1;9-13.
- [33] 黄国文. 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的假定和原则[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7(6): 880-889.
- [34] 黄国文, 刘明. 导读. 话语分析核心术语[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ix-xlii.
- [35] 黄国文, 徐珺. 语篇分析与话语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10): 1-6.
- [36] 黄国文, 赵蕊华. 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J]. 现代外语, 2017(5): 585-596.
- [37] 李继宗, 袁闯. 论当代科学的生态学化[J]. 学术月刊, 1988 (7): 45-51.
- [38] 蒙培元. 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39] 乔清举. 儒家生态思想通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40] 赵蕊华, 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访谈[J]. 当代外语研究, 2017(4): 15-18.
- [41] 郑家栋. 自然和谐与差等秩序[J]. 中国哲学史, 2003(1): 11-12.
- [42] 周文娟. 中国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理念与实践[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3): 24-28.
- [43] 邹冬生, 高志强主编. 当代生态学概论[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

From 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bstract: The past 30 years or so have witnessed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ecology within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ecolinguistic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outline a Halliday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which is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fter the review of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the research aim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 object of studies as well as the linguistic model underlying the approach -- are outlined and discussed.

Keywords: 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